

(接上期)

张伯驹为什么最喜画梅、兰、竹、菊呢？因为这四君子最能彰显文人的情操与人品，是历代文人墨客托物言志之物。张伯驹画作的风格多为简洁、淡逸、雅致，耐人寻味。他笔下的红梅一枝，风骨卓然；垂杨飞絮，飘逸清远。

但他画得最多的还是兰。兰，亦称兰蕙，享有“百草之长”“花中君子”和“空谷佳人”的美誉。其香清幽，其色脱俗。孔子曾道：“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节。”因而，兰被视为高尚情操的象征。

张伯驹笔下的兰草，自然寄托着自己的寓意和人品的追求。张伯驹不愧是画兰的高手，线条流畅生动，常常是寥寥几笔，设色雅致，便画出了兰草婉约宜人的风姿，柔美舒放，有超尘出世之趣，给人以幽邃高雅的净化感。那种特有的风格是谁也模仿不了的，笔意绵绵，气脉不断。张伯驹又常在画作上题字“楚泽流芳”，更加彰显了清幽娴雅的意蕴、淡泊高洁的情怀。

张伯驹绘画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楚泽流芳》《墨兰》《垂杨飞絮》《大地皆春》《菊》《梅菊》《红梅图》《梅兰》《一枝初开》等。

当代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对张伯驹的绘画，主要是所画的兰、梅评价甚高，他说：“至于张伯老的兰花，我认为上可以继承赵孟頫、文徵明，下可以并肩薛素素。他的梅花画法，也是另辟蹊径，与众不同。”

张伯驹除了自己单画梅兰竹菊以外，也常和夫人潘素合绘一些花鸟、风景画作，例如，他曾和夫人潘素画了一幅《枫菊图》，颇为清雅。这幅画被他的朋友王世襄看到了，便写了一首诗赠给张伯驹：“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这首诗不乏幽默的打趣成分，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张伯驹的人品与画风。

还有一次是1979年2月，张伯驹夫妇和刘海粟先生合绘了一幅《芭蕉樱桃》，海老绘芭蕉并题“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张伯驹在画上画了樱桃，并在左下角题写了“伯驹自赏”几个字。这次合绘，成了刘海粟和张伯驹绘画艺事上的一段佳话。

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合绘的画作主要有《梅石图》《兰石图》，潘素画石，张伯驹画梅或者兰草，各呈其长，又互相配合，相得益彰，那峻拔的怪石旁一枝红梅或一丛兰草，真是刚中见柔，劲健中不乏高雅之趣。

张伯驹夫妇合绘的画作还有《岁朝图》，张伯驹画梅，潘素画竹子。

在绘画方面，张伯驹夫妇和张大千先生还有一段“隔海补丹青”的故事在画坛广为流传。

这段故事也要从1979年说起。这一年，港澳好友邀张伯驹前往香港举办画展。张伯驹夫妇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国家有关方面鉴于张伯驹在海内外的影响，也希望他能够利用各种关系，多方开辟渠道，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多做工作。这当然也是张伯驹晚年最大的心愿。他首先想到了正在台北摩耶精舍居住的老朋友张大千。

张伯驹与张大千的最后一晤是1948年的农历九月，谁知道这一去却是关山万里，两人从此失去了联系。如今，有了去香港的机会，有了与张大千联系的机会，张伯驹自然不会放过，但当时海峡两岸仍然不通书信，怎么办呢？还是潘素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想到最近常有香港的朋友来京，何不请友人捎给大千两幅画呢？于时，张伯驹让潘素把新近才作的两幅《南国芭蕉图》带给张大千，他要请大千在画上补笔，于是张伯驹给张大千写了一封信。

画与信准备好后，恰逢香港的一位余先生来京，便委托这位旧友将书画带给张大千。

再说张大千接到张伯驹送来的书信和两幅画后，也是非常激动，不久，就在两幅芭蕉图上分别绘一泼斯猫、一素装仕女。

这一段佳话，想来可载入我国的绘画史册而流传后世。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张伯驹书法、绘画的特色，那就是，张伯驹的书法、绘画因其深厚的文学底蕴而形成一种书卷气浓郁超俗的风格，又以其收藏之富、眼界之高提升了他独特的书画艺术。很多人评论其书法、绘画，似乎有碑有帖，有宗有派，又似皆无，似古代某家又不似，最后只有说张伯驹本人才有这种风格，找不出第二人与其相似。不错，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独创的个性，在于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的道路。



张伯驹十五讲
作者 张恩岭

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

张伯驹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最广的，除了他的婚姻爱情以外，就莫过于他的收藏了，甚至可以说，有关他收藏的故事超过了他的婚姻传奇，也掩盖了他在诗词、戏剧和书画方面的成就。一提起张伯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是一个大收藏家。在文化圈还很流行这样一句话：“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以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所收藏的书画文物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巨大的，每一件书画文物的价值都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二是他的收藏情怀和捐献义举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三，很简单，就是他收藏的事迹确实富有传奇性，比起他诗词、戏剧、书画故事呢，更易于口头流传。

好吧，这一章，就讲张伯驹的收藏。

百代高标 千秋丛碧

2018年是张伯驹诞辰120周年，文化和旅游部、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央文史研究馆、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或单独对张伯驹先生进行了隆重纪念，从这些纪念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伯驹的鉴赏和捐献对于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以及国家和民族对张伯驹捐献业绩的崇高评价，这是我们了解张伯驹的收藏应该首先了解的。

张伯驹是1982年2月逝世的，自他逝世以来的30多年间，纪念他的文章和书籍就从未间断发表和出版过，但主要是以个人或单位的名义发表或推出的，而2018年对张伯驹的纪念已上升到了国家和全民族纪念的层面上，在纪念张伯驹的规格、规模和深度上，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说明，张伯驹的收藏业绩和思想光辉愈益显示出其价值和魅力。

2018年4月2日，首先由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吉林省博物院共同举办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展览——“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展出了张伯驹捐献或转让给国家的国宝书画33件（套），都是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这些珍品中包括晋代陆机《平复帖》，唐朝杜牧《张好好诗》卷，宋代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在内的

8件古代书法精品，是1956年张伯驹夫妇捐献给国家的；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宋代赵佶《雪江归棹图》、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转让与国家的；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则是张伯驹赠与毛泽东，1958年主席办公室又将其调拨给故宫博物院的。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收藏的宋代赵孟坚行书《自书诗》。

在这次展览开展仪式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高度赞美张伯驹：“我们至今怀念张伯驹先生，视其为楷模，不仅是对其在书画鉴藏方面成就的赞誉。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

2018年4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了纪念张伯驹的长篇文稿。

2018年5月7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央文史研究馆、国家文物局共同主办的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作了讲话。

2018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百代高标 千秋丛碧》的纪念文章。

这些活动和新华社所发文稿，都是张伯驹逝世30多年来的第一次，充分说明张伯驹的文化成就和人格光辉，已成为民族的精神和骄傲。

《平复帖》与《游春图》

张伯驹是怎样成为一个伟大的收藏家的呢？人们认为，必须具备几个主客观因素：自身的兴趣和爱好、渊博的知识及辨伪识真的眼光、必要的经济基础、购藏的魄力等，此外，还需要历史的机遇。

有人把这几方面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文化，二是财富，三是情怀，四是机遇，而且认为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而张伯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这句话里没有强调文化底蕴，或者说辨伪识真的眼光。这样的人可以不可以成为收藏家呢？可以的，但成不了一个伟大的收藏家。

张伯驹与其他收藏家的区别，我以为就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收藏家。

按照四个条件的要求，第一条，文化，那就不用说了，从以上几章中，我们已不怀疑张伯驹是一个文思敏捷、读书万卷、尤富词作天赋的文化大家；至于财富，可真不是凭主观愿望和努力就可以拥有的，而张伯驹很是幸运，他的父亲开办的盐业银行，为其收藏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当他面对极想收藏的文物时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至于情怀，张伯驹说过两句话，一是“烟云过眼”，一是“予所收蓄，永存吾土”，这两句话，高度概括了张伯驹的收藏情怀，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这一点暂时不予展开讲述；最后一个条件是历史机遇，这是千载难逢的，但被张伯驹遇上了，这就是溥仪盗运宫中书画及后来这些书画的被盗卖与流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成就了张伯驹。

好吧，我们就讲一讲张伯驹的收藏概况。张伯驹一生收藏的文物很多，多达一百件以上，数量是十分可观的，我们这里只能介绍一些他收藏的最为珍贵的文物中少量的几件，以窥大概了。

（未完待续）